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①

樊士德*

(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近年来, 劳动力在地区间抑或城乡间的流动成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乃至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与规律来看, 这种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然而, 在中国, 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何种特征? 与世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性? 又具有哪些差异化的内涵特征和理论含义? 这构成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 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这一领域的不足乃至空白的现状, 更期望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福利效应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并有所启示。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 一般性; 特殊性; 外生性; 劳动力转移刚性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1) 03-0035-12

近年来, 随着中国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上升, 与劳动力流动相关研究也呈不断递增的态势。概括起来, 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 总体描述阶段, 主要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动因、迁移规模测算、个体特征、宏观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其二, 专题深入阶段, 重点侧重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互补及冲突、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外流劳动力的歧视与政策等(蔡昉, 2006)。纵观现有研究, 笔者认为并没有将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区别, 导致单纯地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模型, 如二元经济模型等, 即使有部分的修正研究, 而其研究的落脚点却在于一味地提高这一系列模型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阐释力, 进而形成本末倒置。由此, 在借鉴国外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劳动力流动带来效应之前,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厘清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共性以及差异化特征, 尤其是其特殊性所在, 方能确保后续研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这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概况与趋势

为了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首先对劳动力流动的的总体状况作一简要回顾。经数据收集, 笔者发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等均有

^①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09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与中宏观效应研究—基于欠发达与发达地区视角的考察》(项目编号: 09YJC790151)、2010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0EYB007)、2009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性项目(项目编号: 09SJD790040)和南京审计学院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NSK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 [收稿日期] 2011-04-08

[作者简介] 樊士德(1979-), 经济学博士, 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劳动力流动相关总体数据或部分数据的统计和估计^②。1997-2000年,调查农户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8.1%上升至23.6%^③。2002年,乡村劳动力约为4.8亿人,由此推算出2000年外出劳动力的总规模为11319万人(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3)。此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比2002年增长8.6%;2004年为1.2亿人,比2003年增长3.8%^④。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⑤。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37.7%。在外务工的14041万农民工中,按输出地分,来自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数量比例分别为37.6%、32.7%、29.7%;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71%,中部占13.2%、西部占15.4%。在本地就业的8510万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62.1%,中部地区占22.8%,西部地区占15.1%^⑥。截止2009年5月农民工总量约为2.25亿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亿人^⑦。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比上年增长5.4%。其中,外出农民工15335万人,增长5.5%。而2011年年初,据众多媒体报道,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仍呈现大规模向发达地区外流特征,与此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则通过提高薪酬、福利等方式挽留外流劳动力,呈现两维地区争夺劳动力的态势。

从上述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统计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并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在这些数据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何种特征呢?

二、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

在增长经济学中,构成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传统因子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企业家后来才被纳入研究范畴。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恰恰离不开以上要素的组合或存量、流量的动态变化,即这一系列要素并非静止不变,劳动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不例外,往往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劳动力的动态流动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其他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②从横向看,不同部门的数据并不相同,原因在于统计口径和范围定义并不相同;从纵向来看,差异的原因在于时间界定和劳动力流动的定义上发生变化;具体原因: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之前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3个月以上者,从2000年起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1个月以上者;而人口普查定义的劳动力迁移,仅仅在于居住在户口登记地之外的乡、镇和街道半年以上的人口迁移(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采用的是迁出原居住地一年以上的人口,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则改为半年以上,口径显然比前者要大)。

③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实施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的数据。

④根据该调查中的这些外出劳动力包括在调查期间外出就业和未就业的劳动力。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得来的数据。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R].2006年3月16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⑥国家统计局.截至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N].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年3月25日。这是统计局为了摸清农民工基数及外出返乡情况,利用农民工返乡过节的时机,在全国31个省、857个县、7100个村和68000个农村住户开展的一次大规模抽样调查。

⑦新华社.就业60年变迁:劳动力流动突破城乡二元结构[J].www.aweb.com.cn,2009年05月27日。

第一，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其他国家相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从欠发达向发达地区、从农村向城市、从劳动力富裕地向稀缺地的流动，对于国与国之间、一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均伴随这一趋势，这是符合国际一般规律的流动。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劳动力的国际迁移也同样符合这一规律。在像意大利、德国和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发生严重饥荒和对土地需求的压力严重的时期常常与城市工业有限的经济机会同时存在，推动无技术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劳动力稀缺的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正如布林利·托马斯（Thomas, 1954）所论证的，欧洲劳动力对美国经济曾做过三次显著贡献：其一，1847-1855 年是 18.7 万爱尔兰人和 91.9 万德国人；其二是 1880-1885 年间是 41.8 万斯堪的纳维亚人和 104.5 万德国人；其三是 1898-1907 年是 175.4 万意大利人——带有人口疏散的特点。此外，目前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劳动力也正空前地、大规模地从广大农村流向新兴的城市。事实上，笔者认为从这里可以映射到中国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动到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对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第二，这种劳动力流动基本符合古典的一般理论，这也与西方其他国家较为一致。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和信息对称的假设前提下，且不存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如税收和外部性因素），生产要素一般会从边际产量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产量较高的地区，当要素所有者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时达到均衡。不过，笔者认为刘易斯模型中的传统部门边际产量为零甚至为负的假设值得进一步探讨，或者说并不一定与现实相吻合。此外，劳动力向外流动过程中的“度”也值得提上议程，从农业部门和欠发达地区的后续发展来看，劳动力不可能无限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即并非像刘易斯所认为的传统部门可以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劳动力。

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成为现有研究的共识。事实上从最早的发展经济学中有关人口流动的著名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中蕴含这一政策含义。劳动力从传统部门不断流向现代部门，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完全吸收为止，导致农村工资与城市工资趋于一致，城乡差别消除，最终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从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蕴含着现代城市部门的进一步持续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乃至与此同时的结构调整等方面将享有得天独厚的先前优势，而传统部门的现代化只是作为现代部门更进一步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副产品，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述，无需置疑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促进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效应可能存在不确定的影响，从现有数据来看，可能出现负面影响。如果按照二元经济模型推理，这一漫长的过程可能还在摸索之中，如果用倒 U 型曲线来衡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那么中国目前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地区经济发展效应可能还处在左端的向右上方攀升的部分，即可能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增长，反而使得落后地区进一步落后，这可能构成后面将论述的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

第四，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问题并存，这也是不同国家尤其是初期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尽管国内媒体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的外在负面冲击有所夸张，但是也不能不说明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有：其一，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居民的就业有一定的冲击，从而形成了目前农民工仍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与城镇失业率不断攀升并存的“困境”，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真正的根源有待探究；其二，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城市众多社会问题，如城市的高犯罪率^⑧、

^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媒体犯了一个忽视统计概率和计量分析的错误：媒体往往偏向过多劳动力流向城市，犯罪率提高，是基于现有城市犯罪的人数中有多少为农民工，从而计算出农民工的高犯罪率；逻辑思路是：假设 A 事件表示农民工流向城市，B 表示犯罪，事实上，按正确的思维应该是求 $P(B|A)$ ，才能真正衡量农民工流动对城市犯罪率的影响，而媒体或政府所宣传的是求 $P(A|B)$ 即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农民工，显然高估了农民工所造成的城市犯罪率。

居住的拥挤性、城市面貌的损害（贫民窟的形成）、交通的拥挤性^⑨等。事实上，这种劳动力流动和迁移对发达地区的社会生活影响，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病”就是例证（都阳，2006）。此外，也正如托达罗（1999）所指出的，第三世界的城市日益严重的犯罪、污染和城市拥挤，仅就住房和社会服务的压力日趋沉重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而言，它们也已逐渐超出了历史上城市所带来的好处。这也同样得到了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84）的认同，即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庞大的城市聚集会迫使产生各种效应，尤其是这些城市规模之大，以至于城市区位所带来的经济实惠同城市拥挤的成本相比而变得相形见绌。20世纪80年代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落户的新家庭中，足有72%的家庭位于棚户区和贫民窟。在非洲，这一数字更高，大约为92%（托达罗，1999）。他进一步认为城市贫民区的急剧增加主要是由人口增长和加速的乡—城人口流动所引起的，此外，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尤其是城市规划和偏向的误导政策。这里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问题凸显构成了众多国家的共同特征之一^⑩。

三、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

劳动力流动既可能拉大地区差距，也可能缩小地区差距，结果究竟如何，政策与体制因素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诸如依旧典型的城乡分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农村来服务城市的发展、仍偏向以劳动力的低成本维持高增长与工业化的推进等等。这一系列倾斜性政策放大了劳动力流动拉大地区经济差距效应的一面，而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劳动力流动缩小差距效应的一面被压制或抵消，进而对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宏观政策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笔者认为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外生性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路径表明，移民促进城市的发展与扩大，城市化必然带来更多的移民，或者说，人口增长以及劳动力流动内生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产生对新的劳动力的内生需求，新的劳动力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互动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增长。一般来说，工业化与农业人口的转移是同步的，工业化与农民非农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为促进工业发展而展开的“圈地运动”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工业、贸易、服务业的发展又使城市容纳劳动力的空间大大拓展，为农村人口进城准备了充足的就业岗位——英国的农民就是在工业化逐步深入、拓展的过程中离开土地，投身于非农业领域，移居城市，逐步转化为市民阶层的。在工业化稍晚的美国，工业化与农民非农化过程也是同步的：当工厂制度从欧洲移植到美国后，工业的强大扩张能力导致城市劳动力难以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于是开始“争夺”农村劳动力——工业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吸引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来；农村人口加入工业生产缓解了劳动力紧缺问题，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化的步伐；而工业化的深入又为劳动力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更有利于劳动力的非农化。

但是，在中国，农民的非农化与国家的工业化是脱节的、滞后的、不同步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流动却往往成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前定变量或外生变量——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所工作的城市，没有被城市真正吸收，而是游离于城市化的边缘。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没有正常的社会地位，没有医疗保障，没有政治、

^⑨实际上，大规模、频繁的劳动力流动对交通运输压力应该是各国工业化的共同问题，尤其对于英国和德国的经验教训值得发展中国家引起重视（蒋蔚，2007）。见蒋蔚，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机理、特征、问题及借鉴[J]，欧洲研究，2007（1），第110页。

^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不仅伴随城市化问题突出，同时欠发达地区尤其在农村的贫困化也较为突出，即双“贫困化”陷阱，值得进一步探讨。

文化上的福利，甚至连基本的工资待遇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处于典型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不停地漂泊、流浪，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正如贾樟柯在电影《世界》中所描述的：“我们是飘一代，飘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飘”已经成为农民工身份得不到确认、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文化隐喻。一直以来他们都只是城市的“他者”，他们促进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形成，给城市带去了财富、舒适与便利，却不能享受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成果。在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市民之间，仍然存在一堵无形的墙。在此，笔者想打个比方，如果说城市是个蓄水池，发达国家的进城务工者就像天上降下的雪，可以溶解在水池中，扩大水的容量；而中国的农民工就像外来的油，永远只能漂浮在水面上，不能溶入进去，因为从本质上说二者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以来的政策、观念造成的。

事实上，早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前，就已有较大规模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实现内生性增长和流动，其向现代部门的流动和转移由于众多原因（如政策、文化、观念等方面）相对缓慢，这就进一步凸显出流动的外生性。如表 1 所示：农业就业比例与农业产值结构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 1978 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28.2%，而农业就业比例占社会总劳动力的 70.5%，二者差距达 42%，其滞后度达到 150%；截止 2009 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10.2%，而农业就业仍占 37.0%，二者相差近 27%，这种差异在三次产业中最高，其滞后程度达到 263%。尽管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的转变即劳动力的转移其滞后性更为突出，这构成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特殊性之一。

（二）中国劳动力流动以欠发达地区的空洞化、贫困化为代价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农民工的大批涌入，城市和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空洞化”和越发“贫困化”的现象。空洞化主要是指在农村众多有能力或主要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甚至举家长期流入发达地区，导致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务农人口大幅减少，大量房屋闲置，土地大面积抛荒、农业经济衰退的现象。这些青壮年、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纷纷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多是发达地区排斥的人口，有人将之称为“386199 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照顾孩子和务农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普遍模式。从笔者对欠发达地区的调研可以得到一定的证实（见表 2）。

从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四川之外，其他省份，如安徽、河南和陕西的外出劳动力中男劳动力要多于女性；而且从年龄来看，更能验证和类推欠发达地区的留守人口构成情况，外流劳动力的平均年

表 1 劳动力转移相对于农业产值结构的滞后性

单位：%

| 年份 | 农业就业比例 | 农业产值结构 | 滞后程度 |
|------|--------|--------|--------|
| 1978 | 70.5 | 28.2 | 150.00 |
| 1980 | 68.7 | 30.2 | 127.48 |
| 1985 | 62.4 | 28.4 | 119.72 |
| 1988 | 59.3 | 25.7 | 130.74 |
| 1990 | 60.1 | 27.1 | 121.77 |
| 1991 | 59.7 | 24.5 | 143.67 |
| 1992 | 58.5 | 21.8 | 168.35 |
| 1993 | 56.4 | 19.7 | 186.29 |
| 1994 | 54.3 | 19.8 | 174.24 |
| 1995 | 52.2 | 19.9 | 162.31 |
| 1996 | 50.5 | 19.7 | 156.35 |
| 1997 | 49.9 | 18.3 | 172.68 |
| 1998 | 49.8 | 17.6 | 182.95 |
| 1999 | 50.1 | 16.5 | 203.64 |
| 2000 | 50.0 | 15.1 | 231.13 |
| 2001 | 50.0 | 14.4 | 247.22 |
| 2002 | 50.0 | 13.7 | 264.96 |
| 2003 | 49.1 | 12.8 | 283.59 |
| 2004 | 46.9 | 13.4 | 250.00 |
| 2005 | 44.8 | 12.2 | 267.21 |
| 2006 | 42.6 | 11.3 | 276.99 |
| 2007 | 40.8 | 11.1 | 267.57 |
| 2008 | 39.6 | 11.3 | 250.44 |
| 2009 | 37.0 | 10.2 | 262.75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 年》计算而得；其中 2009 年的农业产值数据来自 2010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其农业就业比重为估计值。

龄四个欠发达地区均保持在 28-35 岁之间；此外，从外出务工时间来看，四个欠发达地区均保持在 8.6 个月以上，最高的为安徽，达到近 9.5 个月，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常年留守人口的结构情况。

从短期来看，在这种模式下，老人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让儿女在外

挣钱，每年的纯收入在名义上可能有所增加，进而能为家庭增收；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会影响农村的长远发展，导致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一，老人虽然能保证孩子基本的健康与安全，但是出于成长期的孩子不仅需要学校的教育，也需要家庭的温暖，需要父母的引导，缺失了父母的关爱，孩子的教育难以得到保障，孩子们在完成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后，大多数又走上了父母所走的打工之路，如此恶性循环，这不管对家庭还是对欠发达地区的长远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二，老人在家务农只能保证基本的温饱，很难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更谈不上科学种田、科技致富，这直接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贫困化、破旧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是以农村的空洞化、贫困化为代价的——农民工在通过将自己的血汗与青春贡献给城市赚取基本的劳动所得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家乡的富裕。

从实践结果来看，长期以来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所造成的这种空洞化，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值得引起关注与重视。根据新余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2005）关于全市“空心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共有 28 个乡镇 377 个村委、3175 个自然村、农户 17.5 万户、农业人口 68.7 万人。全市村庄占地面积已达 14.3 万亩，其中空置和闲置宅基地面积 4.4 万亩，占村庄总面积的 30.8%， “空心村”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操场乡村庄占地面积 635 亩，其中空闲宅基地面积 363 亩，占 57.2%；分宜镇介桥村委 13 个自然村，占地 850 亩，空闲宅基地面积 365 亩，占 43%。此外，根据中国青年报 2009 年 5 月 6 日《世外桃源何以成为空心村》的报道^①，沧桑巨变发生在向家坪，属于重庆奉节县高治乡水塘村三组辖区内，曾经的大山中的世外桃源，已大多人去楼空，成为不折不扣的空心村。具体表现有：80%的村民离开了村庄，导致“地图有此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夜无灯，荒地杂草生”；近半田地撂荒，具体约有 60%的水田撂荒，有 70%的土地撂荒；大多离乡村民宁愿活在城市底层，也不返乡务农。

（三）流动中的劳动力贡献与工资不对等、个体福利并未改善

中国国内的移民就像“在其他情况下的国外移民一样……渴望以任何的代价挣钱，对生活在城市的机会心存感激，易受到被驱逐的威胁，需要接受巨大的竞争，并且没有任何的权利，因为国家不愿意给他们提供权利、福利和保障”（Solinger, 1993）。一方面，有些行业与领域，是排斥农民工的，这是一道天然的门槛；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享受市民应有的待遇，在购房、子女教育、社区服务、民主选举等方面都受到限制；此外，即使农民和市民在同一个企业从事相同的工作，基本工资差距倾向较大，更谈不上和市民一样享受医疗保险、工伤劳保服务和养老保险等。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故这里笔者倾向认为并不对城镇居民就业构成冲击；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保护措施缺乏，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用人单位与工人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十分普遍，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例如，

表 2 2009 年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年龄、性别和务工状况

| 欠发达地区 | 平均年龄(岁) | 性别比(男/女) | 一年外出务工时间(月) |
|-------|---------|----------|-------------|
| 安徽 | 30.85 | 2.11:1 | 9.47 |
| 河南 | 28.55 | 1.82:1 | 8.78 |
| 四川 | 34.16 | 0.82:1 | 9.20 |
| 陕西 | 31.30 | 1.23:1 | 8.64 |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 2009-2010 年分别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开展的实地调研统计所得。

^①田文生：《世外桃源何以成为空心村》，《中国青年报》，2009 年 5 月 6 日。

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一起一个月工作 500 小时使得打工仔累死的事件。该厂长时间加班，每月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500 小时，但工人月工资最低的只能拿到 300 元。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承担市民所无须承担的高额成本：第一，忍受歧视与偏见。由于制度的原因，也由于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农民工在城市要遭受来自市民社会的歧视与偏见，比如农民工常常被作为没文化、素质低、破坏公共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模板而看待。一旦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总是首先将怀疑的对象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社会学家艾利亚斯（Elias）将之称为“污名化过程”（Stigmatization），即一群人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身上加以维持的过程。第二，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法律知识的欠缺，农民工在找工作、打工的过程中常常有被骗钱、被拖欠工资的经历。据统计，有的地方 50% 的企业都有这种情况，拖欠时间从 1-5 个月不等，有的甚至一年多。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对“三无人员”实行遣送的做法，一有重要活动，农民工也往往成为被驱赶的对象，以保证市容和交通，以及消除威胁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隐患。因而，外流劳动力，不得不有这样那样的担忧，这也是其需要承担的额外成本之一。第三，情感上的负担。很多农民工都是把孩子、老人留在这里，而自身长年在外，不得不忍受思念家乡与亲人的痛苦，这构成了心理成本之一；每到年关，高额的旅途费用、拥挤的交通都只有他们需要去承受，这一系列成本市民则不需要承担。

这里，笔者同样结合实地问卷调查来考察外流劳动力的收入情况，如表 3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外出劳动力无论是从流入地——发达地区，还是从流出地——欠发达地区的实地调研来看，其最终的净收入相对较低。从第 4 列粗略观察来看，名义平均月净收入相对较高，分布在 800-1700 元这一区间（第 2 列中安徽的平均月收入较高，笔者结合问卷统计分析认为，由于有很大一部分在浙江和马鞍山从事创业和投资，收益相对较高因而拉高了平均收入），然而这一收入净额也只是扣除了外流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主要花销成本项目，而并未包括其他零星的货币化开支以及后文将专门探讨的有意规避或降低的货币化成本，更未反映众多外流的无形成本，如心理成本等。这里单纯扣除一项有意规避或降低的货币化成本

200 元（笔者认为仅为保守估计），净收入仅为 600-1500 元。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按这一方式计算仍较为偏高。由此，为了进一步把握其最终真实的净收入状况，从汇回或带回的收入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除江苏和安徽以外，基本分布在 300-800 元区间，这一收入区间则是扣除了外流劳动力直接承担

表 3 2009 年外流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情况

单位：元

| 地区 | 平均月 收入(1) | 平均月 开支(2) | 平均月净 收入(3) | 一年汇(带)回 家的收入(4) | 平均务 工时间(5) | 平均月汇 (带)回(6) | 扣除有意规避和 降低的余额(7) |
|------|--------------|--------------|---------------|--------------------|---------------|-----------------|---------------------|
| 发达： | | | | | | | |
| 广东 | 1943.26 | 860.50 | 1082.76 | 4075.26 | 9.10 | 447.83 | 227.83 |
| 浙江 | 2228.74 | 493.75 | 1734.99 | 7600.32 | 10.20 | 745.13 | 545.13 |
| 江苏 | 1763.32 | 677.89 | 1085.43 | 10126.23 | 9.25 | 1095.32 | 895.32 |
| 欠发达： | | | | | | | |
| 安徽 | 2296.58 | 658.92 | 1637.66 | 8435.17 | 9.55 | 883.17 | 683.17 |
| 河南 | 1377.67 | 563.84 | 813.83 | 7248.31 | 8.78 | 825.55 | 625.55 |
| 四川 | 1923.25 | 759.63 | 1163.62 | 2005.33 | 9.20 | 326.67 | 126.67 |
| 陕西 | 1792.43 | 566.32 | 1226.11 | 8255.2 | 8.64 | 955.46 | 755.46 |

注：(1)第 7 列为平均月汇回或带回的收入数，采用的是第 5 列除以第 6 列，即一年汇回或带回收入除以在外务工的年均时间（单位为：月），而并非 12 个月。与第 4 列并不相同，第 4 列为月收入扣除主要的月开支，而本列通过问卷调查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实际回流净额或者实际的净收入。由于统计方式与处理方法不同，故有不一致之处；(2)第 8 列为第 7 列扣除有意降低和规避的增量货币化成本后的余额，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情况，这里笔者假定有意规避和降低的增量货币化成本为 200 元。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 2009 年-2010 年分别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开展的实地调研统计所得。

的众多外流成本后的净收入，然而并未扣除笔者后文将专门探讨的故意规避或降低的差额货币化成本。如若扣除则得到第8列所示的净收入余额，即使不做扣除，其外流净收入已显偏低。

总体来说，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实现了一种职业转移，但并未实现身份转换，并未能享受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福利，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并不对等。

有学者认为，生产要素流动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生产要素本身流动，而所有者并不改变他的居住地；第二，所有者与其生产要素一起流动。第一种流动的典型形式是资本。来自输出地的工人也可以视为第一种要素流动。来自输出地的工人一般不享受输入地的所有福利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险等）。第二种流动一般指劳动力转移，通常称为移民，这种流动会引起许多与福利社会相关的问题：失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教育等，这一要素与第一种要素流动没有关系（拉辛、纱卡，2002）。由此来看，中国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看似是一种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然而一般并不改变自身的户籍地，实则是第一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因为这些劳动者并不享受发达地区与城市相关的福利待遇，这也体现了国内流动的特殊性。

（四）劳动力“钟摆式移动”与“转移刚性”的并存

每年春节前，在外地谋生的农民工如潮水般涌回家乡，节后又如潮水般从欠发达地区涌出，象永恒的钟摆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摇摆。基于此，有学者将农民工流动的这种规律称为“钟摆效应”（周大鸣，2005；李明桥等，2009）。这是中国普遍的劳动力流动特性，在一些西方国家却并不存在这种明显的钟摆现象。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流动的钟摆效应与春节紧密相关，但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更有深层次的原因。这种效应不仅与节假日相关，在特殊的时期也会体现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便是一个明证。当发达地区有劳动力需求时，农民工便大批量流入；一旦危机出现，在外打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农民工便被迫返乡，寻求虽不富裕但却安定的农村生活或另谋出路。其身份的不确定性与务工目的明确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停留基点，只能像钟摆一样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晃动（见图1）。

在笔者看来，钟摆效应产生是压力和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大量流向发达地区既有压力，也有动力：压力在于众多欠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凋敝，土地资源有限，创收渠道单一，生活压力很大；动力在于发达地区名义上的高工资待遇和预期的城市化生活，在这两股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大量流向发达地区。而流出后的农民工出现部分回流状况，也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压力来自二元社会结构——严格限制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歧视农民工的收入分配、福利制度，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认同，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发达地区，无论从权力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找到安全感、稳定感^⑫；与此同时，家乡至少有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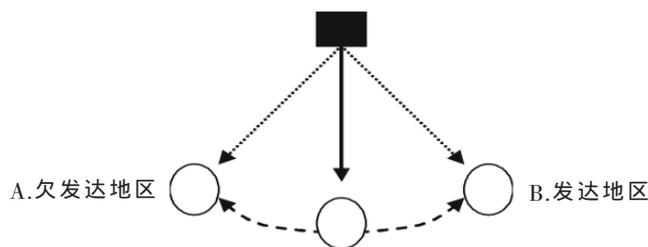


图1 劳动力流动的钟摆模型

^⑫在2009年6月2日贵州卫视播放的关爱中国农民工慈善晚会上，主持人倪萍说到：“除了钱，农民工兄弟还需要一份尊重，一份理解，一份平等，一分公平。”此外介绍了四川农民工邝文华的故事，为多挣点钱而在深圳修自行车，而按深圳新规定，再也不能随意摆摊修车，而他女儿邝丹也因户籍问题只能回老家上高中。邝文华在现场表示：事实上在城市打工的日子中，更让他觉得承受的压力远远要比所挣的钱多得多（印证了笔者的“增量”成本较高）。邝丹在演讲中提到：我爸爸最大的奢望，就是能睡一次午觉。但我不禁问爸爸：你累吗？一年365天，每天清晨4：30出门摆摊修车，从没超过5点钟；晚上要8点钟，或早一点7点钟，从没早过6点回家。我问爸爸：为什么要如此辛劳？爸爸说：为的是我能坐在这个（城市）教室里，和大家一起学习。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有一个引以为自豪的爸爸？主持人白岩松在“和”的话题中谈到“所有的人和政策都对农民工和善一点，别让农民工讨工资的时候都站楼上去。”

有亲人，能找到自己的尊严（笔者的苏北问卷调研中充分展现了这一点），这一情感的引力吸引着农民工在特殊的时期，如节假日、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回到他们不可能常留的家。

所以，归根结底，钟摆效应产生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地区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的引力；一个是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产生的压力。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工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农村找不到发展的路子，在城市又没有安生立命的根基，也即时常处于来回被“挤压”的困境。究竟上图 1 中的指针会摆向何方？笔者认为要取决于四个核心因素：劳动力流动相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欠发达地区的综合因素（压力与动力）、发达地区的综合因素（压力与动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中间因素（更多的为横亘的障碍因素）等。总的来说，应该取决于这四个要素的综合权衡与作用力。

在钟摆效应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流动还存在另外一个特征——转移刚性：即一部分外流劳动力不再回流到欠发达地区。

正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劳动力流动或者说转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将成为长期的和不容忽视的因素与内在动力。例如，城市在对待外来劳动力问题上面临两难处境。控制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发展不利。根据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的分解（袁志刚等，2005），1980 年以来，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 10%。然而笔者研究发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在关注到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促进该地区迅速发展的同时，却牺牲了劳动力来源地的经济增长，其逻辑在于：长期以来，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发达地区流动，进一步拉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却相对不仅没有得到加快，反而是减慢了其经济发展，加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后面章节将专门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导致发达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那么这一过程中衍生出一个较明显的、较重要的问题：生产要素成本尤其是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用工成本提高。

出于综合因素的考虑，近年来发达地区很多企业开始向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转移，然而与之相伴的并未发生劳动力的“回流”，其重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名义工资落后地区要低于发达地区；第二，是一种文化上的不适应。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外出务工者，大多有了一定的务农经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中学毕业就来到城市，在打工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渐渐熟悉了这种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是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观察和接触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但这种接触和观察对他们的影响巨大。1995 年 7 月在广东东莞、深圳和中山等地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月薪千元以上和千元以下的打工族中，表示不再适应过去生活者均高达 95%^⑬。这里笔者（2010）将其定义为“劳动力转移刚性”（见图 2）。

这种转移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笔者的调研中得到验证，如表 4 所示：首先，当假设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同样可以实现就业，并且工资保持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并不考察户籍变动），选择可能外流的比例仍然较高，除了安徽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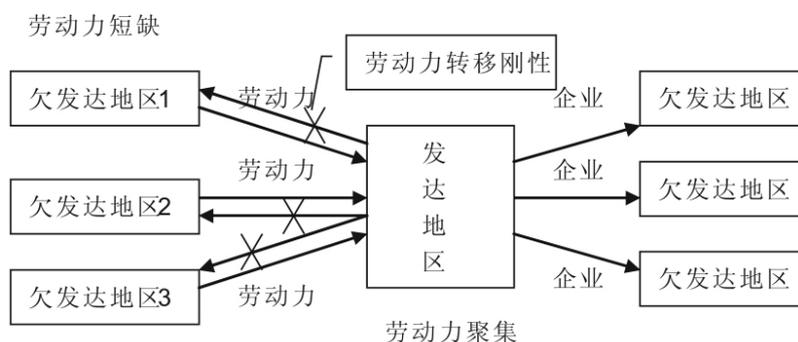


图 2 劳动力转移刚性

⑬ 陈耀明. 农民工的新选择.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58784/58789/4128418.html>, 2006 年 2 月 21 日。

河南以外,基本保持在50%以上(其中各省份的外流劳动力肯定选择流向发达地区的比例分别为:10.23%、14.62%、17.76%、11.15%、17.43%、13.24%和63.55%)。笔者对这里所调查的肯定选择外流比例这一数据持偏低态度,而且从表中第4列可以得到验证。不过尽管如此,仍足以验证笔者提出的劳动力转移刚性特征。其次,自农业税取消后,对其回到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并不存在吸引力的劳动力比例,无论

是从发达地区还是从欠发达地区的实地问卷调查来看,都较高,基本均保持在60%以上。再次,从第4列的劳动力未来是迁出还是留守农村来看(这里考察的是户籍变动),决定迁出比例除四川以外,基本分布在15-30%这一区间,陕西省更高,保持在44%左右。这里如若再包括未来根据收入变动情况来决定的部分,无论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各省份的比例基本将发生较为明显的提高。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足以验证,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劳动力存在笔者所提出的转移刚性这一倾向和长远的外流定势(调查中发现选择留守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与年龄、传统观念等具有很大关系)。

这种转移刚性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使得发达地区并不宽松的就业环境进一步恶化,这里反过来又使得其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或者被延后;此外,这种不回流,尤其是技术、能力较高劳动力的外流定势还将对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构成负面效应,甚至存在阻断产业转移与承接的可能性。

(五) 流动劳动力的制度性边缘化

由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的有限性,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城乡分而治之的政策策略,其结果是形成了两极对比鲜明的城乡二元体制,在该体制下,资源配置与发展呈现以下特征: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把农村和农民仅仅作为外围和补给线。这种二元的社会结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使农民日益陷入相对封闭的状态,难以形成健康健全的人格;在政治上,农民缺少参与的平等机会;在政策上,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行政上,农民是被管理的对象;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难以形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林光彬,2007)……而当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开始涌动,农民开始奋力跳出束缚自身多年的土地,到城市里寻求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寻找自身发展与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时,他们又面临着新的压力、挑战与不公——农民工与市民为什么不能同工同酬?农民工子女为什么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甚至无学可上?农民工为什么不能享受城市工人的基本社会保障?……这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户籍制度、源于城乡二元经济制度、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到目前为止,城市社会还未对农民工作制度上的认定,尽管他们也承认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户口问题。户籍制度的樊篱横亘在城乡之间,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益(政

表4 劳动力未来的流动决策调查情况

单位: %

| 地区 | 两地区工资基本相同 情况下可能外流比例 | 农业税取消对其 无回流引力比例 | 未来的长远打算 | | |
|------|------------------------|--------------------|---------|-------|-------|
| | | | 流出 | 留守 | 偏向收入高 |
| 发达: | | | | | |
| 广东 | 50.33 | 66.72 | 30.34 | 31.22 | 38.44 |
| 浙江 | 58.02 | 65.61 | 18.40 | 41.51 | 40.09 |
| 江苏 | 55.32 | 76.15 | 11.52 | 36.65 | 51.83 |
| 欠发达: | | | | | |
| 安徽 | 11.15 | 68.41 | 30.45 | 61.86 | 7.69 |
| 河南 | 17.43 | 76.25 | 16.53 | 52.54 | 30.93 |
| 四川 | 77.24 | 78.32 | 5.82 | 21.26 | 72.92 |
| 陕西 | 63.55 | 59.15 | 44.21 | 48.42 | 7.37 |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2009-2010年分别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开展的实地调研统计所得。

府偏向城市的战略倾向、偏向国有大企业和大项目将这一状态更加剧了这一无形屏障)：尽管不少农民已经在城市“打工”多年，但依然是“农业户口”，而在中国，“户口属性”已成为身份象征，只要户口性质不变，不管你从事的什么工作，为社会做了多大贡献，其身份标志都没法改变。

此外，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要履行一大套复杂的手续，并要为此缴纳一笔可观的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据《财经》杂志(2001)披露：前往北京的农民需要在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费50-80元/年；进京后，不论在京时间长短，还要按照《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申领《暂住证》，并需缴纳管理费180元/年，证件工本费8元；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管理条例》，外地来京人员还需由用人单位代为办理《就业证》，缴纳管理费180元/年，证件工本费5元。此外，还需在工作所在地卫生部门办理《健康证》，费用为每年40-50元；若为育龄妇女，则还需办理《婚育证》，每证5元；如果所从事的工作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资格的工种，还需经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办证费为每证4元。以上证件如果办齐，来京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

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的今天，农民和市民福利不平等的状况仍未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的生老病死几乎没有任何保障。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保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保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截止目前来看，我国大约90%的社会保障资源用于仅占20%人口比例的城市居民，而仅10%的社会保障资源被农村80%的农村居民所分享，足见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总体来说，中国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而笔者认为，这种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关制度和体制造成的。

四、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尽管我国劳动力流动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然而其所呈现出的特殊性更值得关注，如长期以来劳动力流动的外生性特征、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后的贫困化与空洞化趋势、外流劳动力的贡献与工资福利回报呈现一定程度的不对等、钟摆式特征与“劳动力转移刚性”并存后续可能转向回流刚性占主导的总体特征、外流劳动力主体的身份与制度的双重边缘化等。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这种特殊性需要从两个层面引起学界、政界的重视：

其一，理论上的差异化。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或照搬西方劳动力经典理论模型，而需要将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这种特殊性纳入进行专门性的考察与研究；

其二，实践上的差异化。这种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效应的差异化，进而也会形成与经典理论的“悖论”特征，由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乃至微观规制与引导的实践中需要重点考察这种特殊性。

鉴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这种特殊性，笔者认为，与中国劳动力流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和考察，如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地区间福利的外在影响何在？其对地区间利益的博弈与协调、欠发达地区的超常规发展等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劳动力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应当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内在启示？鉴于篇幅，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分专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

[参考文献]

[1] 蔡昉.集成劳动力流动的研究[J].转引自蔡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年版,第1页.
- [2]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 [3] 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 the Atlantic Econom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8.
- [4] Robert S. McNamara, "Time Bomb or Myth: The Population Problem" [J],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2.1984. pp. 1107-1131.
- [5] [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M].黄卫平,彭刚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 [6] Solinger, Dorothy J., "China's Transients and the State: A Form of Civil Society" [J],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1, No.1.1993. pp.91-122. 见蔡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页.
- [7] [以]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著.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要素的国际流动[M],康以同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 [8] 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 [9] 李明桥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钟摆现象”的解释[J].人口研究,2009(1).
- [10] 袁志刚等.城市劳动力供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上海的例证及启示[J].复旦大学学报,2005(6).
- [11] 樊士德.基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调整宏观背景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新特点[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3).
- [12] 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J].读书杂志编.改革.反思与推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6页.
- [13][14] 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 [15] 杜金岷,奚宾.劳动力流动对经济贡献分析——基于期权视角[J].南方人口.2010(4).
- [16] 钱文荣,郑黎义.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基于江西省四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10(4).
- [17] 叶健夫,彭启鹏,黄春红,刘建民,钟作勇.广东流动人口研究[J].南方人口.2003(1).

The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Fan Shi-de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 Labor migration among regions and between the urban-rural has been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in labor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s. The world economy development history proves that such labor mig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economic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key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labor migration, such as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labor migration? What differences are there in China's labor migrat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are the conno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labor migration? These are the core questions of this paper. Understanding these questions will patch up the shortag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f the field, lay solid foundation and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economic effects, the welfare effects of China's labor migration and associa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Generality; Particularity; Exogeneity; Rigidity of labor transfer